

新冠疫情下印度的国内国际形势

杨晓萍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印度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致使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外交战略大幅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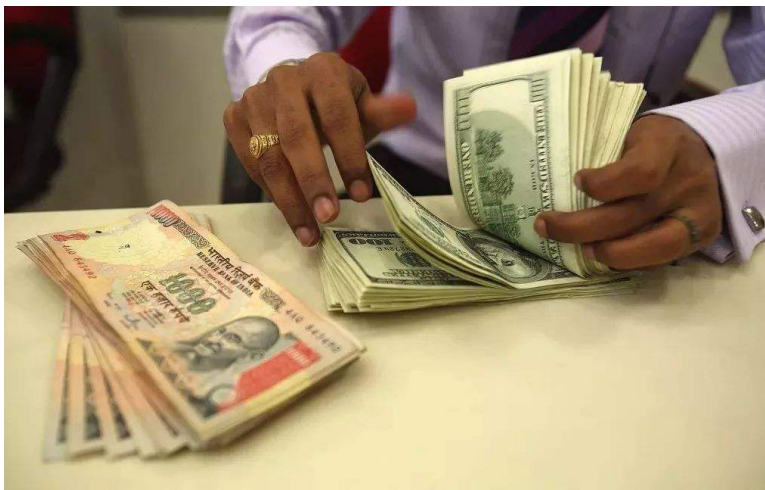
国内形势

就印度国内形势而言,可以用“三最”来加以概括:一是疫情加剧了印度经济的下滑,印度GDP经历2014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二是莫迪在印现有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其系统性的“牵制力量”最弱;三是印度国内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成为世界最高,政府可用政策工具有限。

第一,新冠疫情加剧了印度经济的下滑和衰退,印度经济遭受重创。同时,莫迪政府坚定推进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亲资本、亲大企业”导向明显。

实际上,印度经济增速自2018年就逐步下滑。2019财年—2020财年印度经济增速已经降至4.2%,远低于上一财年的6.1%。疫情爆发后,2020年4月—6月印度GDP总额仅为26.9万亿卢比,比上年同期下滑了23.9%,是印度自1996年发布GDP数据以来最大的跌幅。据经济学人智库报告预测,2020财年—2021财年,印度GDP实际增长将为-8.5%。仅在2020财年—2021财年第一季度,印度GDP下降的额度就相当于2019年印度全年GDP产值的5.8%,也大约相当于印度西孟加拉邦一个大邦一年GDP总产值。

疫情还导致印度失业人口的增加和物价的上涨。预计,2020



印度“废钞令”一度使经济陷入萎缩

年印度国内失业率将高达10.8%,通货膨胀率将高达5.7%。为应对疫情,印度政府将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受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印度的财政预算收入约为3.1万亿元,损失将近1767亿元。当前,印度政府已计划将印度GDP的1%~1.5%的财政资金用于抗击疫情。初步预计,2020财年—2024财年,印度财政赤字率将远高于2015财年—2019财年财政赤字平均值3.8%。反应在货币上,高通膨率和经常账户赤字,必将使印度卢比在未来五年面临巨大贬值压力。

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坚定了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决心,出台了系列“亲资本、亲大企业”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法案。一是劳工法案。2020年9月23日,印度联邦院通过了《2020年劳资关系法》《2020年社会保障法》和

《2020年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法》三部劳工法案,这标志着印度劳动改革在立法层面取得巨大进步。《2020年劳资关系法》为大中型行业的雇佣和解雇领导者提供了新的法规指引,使印度的大型企业(300人以上)裁员将比以往更加容易。二是农业法案。2020年9月20日,印度联邦院通过了《2020年农民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化)法案》和《2020年农民(赋权和保护)价格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新农业法案允许农民直接向集团买家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出售农产品。这在根本上冲击了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中间人”制度,也颠覆了印度零售业的家庭作坊模式。其影响不仅仅只是削弱了农民的议价能力,更反映出现任政府对销售模式从“传统家庭作坊模式”向“大型零售模式”转变的默许,而这长期是印度

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

第二，莫迪总理在印度人党内和政府内阁中的主导地位加强，所面临的体制内牵制力量降低。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引发了印度不同宗教、族群之间的“撕裂”。

2019年5月，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印度人民院（下院）的选举中获胜，获得了542席中的303席。这是莫迪所在的印人党第二次获胜。与5年前相比，印度国大党的牵制力量更加弱小。印人党的持续崛起，并不是因为“莫迪改革”所带来的实质性结果。相反，更多是基于莫迪在国内政治实践中，巧妙利用了“印度教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法宝，从而达到凝聚国内共识，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

2014年莫迪当选之后，曾颁布了“废钞令”、税改（GST）等“激进”措施，大大触动了印度传统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在2019年大选年之初，这些力量“合流”对莫迪进行了“反扑”，给莫迪造成了巨大压力。在2019年1月的民调中，莫迪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仅以微弱多数领先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莫迪及其所在的印人党重拾了“印度教主义”这一法宝。通过对巴基斯坦展示“不受核武器威慑”的超级强硬态度，以及在国内对穆斯林采取有违印度宪法基本精神的歧视性政策，成功塑造了“莫迪是印度守护者”的大众认知。

由于系统性牵制力量的不足，印度当前国内政治生态的“印度教主义”特征明显。2019年12月，由印度人民党推动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印度议会获得通过。此法案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进入印度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三国非法移民印度公民身份。根据该法案，包



印度总理莫迪在任期间，主导地位得到了很大加强

括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基督教的信徒都有资格申请印度公民身份，而惟有穆斯林被排除在外。这种具有明显宗教歧视的法案在印度国内引发激烈的抗议甚至骚乱，并且一直延续到新冠疫情的爆发。

第三、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创新高，凸显印度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薄弱，政府可用政策工具有限。

据India Covid-19 Tracker网站数据，截止2020年9月27日，印度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病例5990581例。其中治愈4938688例，死亡94534例。在地理分布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确诊病例最多，为1321176人，其次为安德拉邦，泰米尔纳的邦和卡纳塔卡邦，集中于印度的西海岸线沿线。印度首都德里也是重灾区之一，当前确诊病例高居全国第六位，为267822人。

印度媒体报道，在2020年9月23日的首席部长视频会上，印度要求德里、马哈拉施特拉邦等7个疫

情最严重地区的部长，考虑重新实施短暂封锁措施，以遏制疫情蔓延。单一的封锁措施，凸显了印度社会治理综合能力的缺失。2020年3月25日，在没有经过周密协调的基础上，印度政府只在简单的宵禁“试水”之后，就在印度全境实行全民居家隔离21天的“封城”措施。火车停运，航空停航。“封城”导致百万人失去工作，大量失业者被迫徒步返乡。食物短缺、恐慌性聚集以及常规医药用品的匮乏，大大增加了“无症状感染”和“二次感染”的几率，很多印度媒体都担心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除了考虑“再次封城”，印度政府用于疫情的资金也较为有限，资金到位困难。2020年3月26日，在印度“封城”之后，印度公布了1.7万亿卢比经济救助计划；5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将推出20万亿卢比一揽子计划。

外交战略

印度国内经济的困境，应对疫情时政府政策工具的有限，加

上莫迪第二任期的内阁不受其他政治力量的牵制,使当前印度面临的战略环境、自身定位、国家利益经历最大调整。在外交上,主要表现为印度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上升,从而对地区稳定、中印关系及大国战略互动都增加了不确定性。

第一,莫迪政府以“印度教民族主义”重塑印巴互动新常态,对巴基斯坦采取“极限施压”和“战争边缘政策”,导致南亚地区不稳定性增加。

2019年2月,莫迪政府以“印度教民族主义”凝聚共识,对巴基斯坦采取了“战争边缘”政策,派出战斗机对巴基斯坦进行空袭。这打破了印巴两国自1971年以来不以军机进入对方领空的历史,也挑战了印巴两国自拥核以来,建立在最低有效核威慑基础之上的“非对称性”战略平衡。更危险的是,此次空袭事件之后,印度战略界将之解读为今后印度对巴反应模式的“新常态”,印度对巴政策的投机性增强。

2019年8月,印度在克什米尔议题上对巴基斯坦下“重手”,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并撤销查谟

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这不仅引发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人民的反抗,还引爆了印巴间激烈的争端。之后,印巴两国互相关闭了领空,暂停了双边贸易,降低了“外交级别”,印巴两国在过去十几年努力改善关系的外交努力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第二,以“国家安全”名义将“中国威胁论”合理化,持续推进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脱钩”,并积极配合美国“去中国化”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莫迪政府在经济上实行与中国“脱钩”,主要表现为:一是限制中国的投资。2020年4月17日,印度商工部下属的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更新了FDI(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将中国从“自动审批路径”改为“政府审批路径”。这意味着之前很多可以直接操作的申请,现在必须事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审批。二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直接禁用了共224款中国的app。这基本阻断了中国大部分企业在印度发展的途径,人为阻止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盈利。三是在贸易上,逐步减少中印双边贸易额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2020

年4月—6月,中印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了23%,从214.2亿美元下降到165.5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从2019年同期的131亿美元降至54.8亿美元。

与此同时,印度积极配合美国的“去中国化”。这主要表现为,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并实行产业链对华脱钩的大战略下,印度也尾随其后,主动在经济领域和中国拉开了距离。并欲“背靠”美国,借机大力发展印度本土的产业链,成为不在产业链上被中国“掐脖子”的自主独立的大国。2019财年—2020财年,印度自华进口下降的产品包括蓄电池、人造纱线及织物、铝及其制品、玻璃及其制品、纸板及其制品,以及其他塑料制品。由此可见,印度也显示出在“中低端制造业”上依靠本土的雄心。此外,为加大对印度本地市场的保护,印度对大约550个关税项目实行外贸政策的“限制”“禁止”进口类别。

第三,从前沿技术角度认知国家安全威胁的转型,积极深化美印安全和防务关系,并夯实美日澳印“四国联盟”机制化。

21世纪,5G技术和5G网络将构成从金融网络、电信、交通和能源网络,到国防和情报等关键政府服务的基础设施。对印度来说,在关键技术上完全依赖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印度国家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部长近日表示,印度并不打算将华为和中兴排除在5G基础设施建设合同之外。为应对5G和AI时代印度面临的新的安全威胁,印度积极深化与美国的安全与防务关系。2016年,印度与美国签署了《后勤保障协定》,允许两国军方使用对方的海、陆、空军事基地提供后勤保障;2018年,美印双方签署了《通信兼容和安全协议》。根据该协议,印度将允



印度仓促的“封城”致使大量失业者被迫返乡



印巴冲突不断，两国关系2019年再次跌入冰点



印度积极“去中国化”，希望本土企业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产业

许在从美国进口的武器装备上安装美制通信设备；2020年，据印度媒体报道，美印将在双方首次虚拟“2+2”会谈结束后，最终签署《基础交换与合作协定》。此协议签署后，美国与印度将共享卫星和其他传感器数据，进一步提高印军的目标定位和导航能力。至此，印度在迈向“有实无名”的美国盟友的战略方向上，又进了一步。

除了提升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关系，印度也积极配合“四国联盟”机制的军事化。2020年6月，印度与澳大利亚签署了《相互后勤支持协定》，允许双方军舰和飞机使用彼此的军事基地进行后期补给。2018年，印度与日本就开始谈判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以允许印度军队和日本自卫

队使用彼此军事基地提供后期保障。一旦最终签署，美日印澳四国之间就能够形成一个共享的军事基地和后勤相互支持防务体系。

结语

新冠疫情加剧了印度经济的下滑和衰退，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受挫。据经济学人智库报告预测，从2022年—2025年，印度GDP增长的平均值约为5.3%，远低于2015年—2019年的平均值6.7%。

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印度在经济上实行与中国“脱钩”，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实行在产业链上的“去中国化”。这或与莫迪政府培育印度本土产业的“谋虑”有关。然而，从

更宏大视角看，其核心仍是在中美竞争加剧大背景下，印度对自身所面临战略机遇和挑战的判断。在实际效果上，虽然印度积极配合美国重塑国际产业链的努力，但印度能否最终有能力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部分产业，仍取决于印度国内经济改革的最终成果，以及印度国内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莫迪政府当前实行某些“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正在加剧印度社会的撕裂。需认识到，这些政策并不仅仅只是“反穆斯林”，而是从根本上挑战了印度建国的基本设想。即印度是一个多元的、世俗的国家，还是一个极化的、宗教的国家。当前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也将在根本上给印度的民主留下污点。在地区安全上，《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不仅只针对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而且也针对阿富汗、孟加拉国这两个伊斯兰邻国。这将是印度周边外交需要面临的新问题。

与东盟国家可能面临的在“中美间选边站”的难题不同，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当前对自身定位和战略环境面临的选项，可能更是“谁是印度发展的推进器？谁是印度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就当前印度对华政策而言，中印发展伙伴关系，可能正在印度方面经历着质疑与调整。印度现任外长苏杰生在其新著《印度方式》中提到，“中国的崛起对印度这个邻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在多极化的世界，印度需要更加迅速灵活的外交政策组合。”在5G和AI时代，中印作为发展伙伴，其核心目标仍应是产业链和技术标准的共融与共享，以及互相视为发展威胁，共建一种良性的竞合关系。❖

责任编辑：刘靖鑫